

卡·马 克 思

和

弗·恩 格 斯

1859 年 10 月—1860 年 3 月

卡·马克思

*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¹

1859年 10月 19 日

阁下：

我参加德国报刊工作时 攻击过奥格斯堡《总汇报》，《总汇报》也攻击过我。

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这当然不会妨碍我尽力帮助它。附上的文件，在伦敦这里，是具有司法文件作用的。不知在奥格斯堡是否如此。

我之所以要取得这份文件，是因为布林德不肯承认他向我和其他人说过的话，而我把这些话又告诉了李卜克内西，他对匿名传单里的揭露也就毫不怀疑了。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① 关于这一点 见本卷第 187—189 页。——编者注

② 卡·布林德《警告》[传单] ——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0 月
19 日

载于 1859 年 10 月 27 日奥格斯
堡《总汇报》第 30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 · 马克思

对和平的激进看法²

1859 年 10 月 20 日于巴黎³

法国和奥地利的全权代表在苏黎世签订的和约，就其要点而言，不过是维拉弗兰卡条约⁴各条款的翻版。由于有关最后和约的谈判占用的时间几乎比在曼图亚城下突然停止的军事行动的时间长一倍，很多轻信的人便以为，和平缔造者们之所以裹足不前，是因为路易·波拿巴抱有某种深思熟虑的计划。他们说，波拿巴想给意大利人充分的行动自由，允许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以便在意大利的统一巩固起来之后，这位法国解放者能够体面地摆脱他向弗兰茨-约瑟夫作出的难堪的让步和承担的义务而诉诸既成事实这一至高无上的力量。政治协定也不能摆脱私人契约可能遇到的那种偶然事件的影响 按照拿破仑法典⁵的规定，一旦受到无法预见的情况 的阻挠，这种契约即告失效。持这种见解的人又一次暴露了他们不仅对

原文是 force majeure 是从拿破仑法典第 1148 条中摘引出来的话，这一条宣称：“如果由于无法预见的情况或偶然事件妨碍了债务人，使他不能履行他应尽的义务，或者做了禁止他做的事情，不得向其追索任何赔偿。”——编者注

他们心爱英雄的性格无知得可怜，而且对于从“红衣主教”^①到十二月英雄^⑥以及从督政府^⑦的“恶棍”到 1848 年的“蓝色分子”^⑧的法国传统外交也无知得可怜。这种传统外交的第一条原则宣告：法国的首要义务是阻止在它周边成立强大的国家，因而它无论如何都要维持意大利和德国的反统一的宪法。明斯特和约^⑨和坎波福米奥和约^⑩都是在这同一政策的指使下缔结的。无限期拖延下去的苏黎世谈判所追求的真正目的，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如果路易·波拿巴企图在 7 月初，就是说，在他自己的军队正陶醉于胜利、意大利人民正热情澎湃、法国正妄诞地以为自己在家里忍受奴役是为了把自由赋予其他民族，并以此安慰自己受伤的自尊心的时候，来实现维拉弗兰卡条约的条件，那么，这位荷兰的僭位者^⑪就会助长狂暴的敌对势力，而对付这种势力要比攻破明乔河和阿迪杰河之间的坚固四边形要塞区^⑫困难得多。这样他也许就不能依靠自己的军队，也许就会促使意大利行动起来，而且很可能就会为巴黎起义发出信号。要从为了适应当时情况而演出的崇高传奇剧转到事先设下的骗局的细枝末节上去，他所需要的不外是时间了。法军仍然留驻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但是它已经从解放军变成占领军了，而且它和当地居民的日常关系远不是友好的，因为，像常见的那样，密切的接触产生厌恶感。从法国方面来讲，它已从短暂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它对出现欧洲同盟这个危险感到震颤，它在反复思虑：它丧失了旧的军队同时又欠下了新的国债；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信任拿破仑观念。至于意大利本身，它的状况我们应该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官方的声明来判断。我们看到，加里波第没有得到足够的钱来替他的志愿军购买武器，^⑬虽然这

支军队的力量和独立战争¹⁴期间汇集在普鲁士旗帜下的人群比较起来几乎是滑稽可笑的，而当时普鲁士的领土比伦巴第还要小。

马志尼本人在给维克多-艾曼努埃尔的信中¹⁵承认 全民族的热情洪流正迅速地在各省的水洼里冻结，恢复原状的条件正迅速地成熟。诚然，在维拉弗兰卡条约和苏黎世和约之间的沉闷间歇期，在各公国和罗马涅上演了好几出由皮埃蒙特一手导演的大型政治历史剧¹⁶；尽管全欧洲的所有下等楼座上纷纷响起了喧闹的掌声，但是这些政治魔术师所玩的把戏仅仅对自己的隐蔽敌人有利。托斯卡纳、摩德纳、帕尔马和罗马涅的居民被欣然应允建立临时政府，把他们已逃亡的君主们的矮小宝座掀倒，并宣布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为被选举的国王。但同时，他们接到了严格的训示：应满足于这些表面文章，要保持平静，其余一切都应听从法国太上皇的旨意，这位太上皇正在苏黎世安排他们的命运并且对热情的奇想、民众激情的迸发和一切革命的越轨行为特别不满。他们不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自己强有力的行动上，而应寄托在自己有节制的举止上，不应寄托在自己力量的强大上，而应寄托在外国暴君的仁慈上。把一份地产从一个所有者手中转交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也不会比中意大利从外国的枷锁下转到民族自治那样平静了。在内政方面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民众鼓动都被完全镇压下去了，新闻出版自由被取缔了，也许，看起来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经过革命的考验而收获了革命的果实。由于这一切，意大利的政治气氛大大消沉下来，以致路易·波拿巴能够提出他事先拟就的决议，而任凭意大利人去发泄他们无力的愤慨。一支法军驻扎在罗马，另一支法军驻扎在伦巴第，一支奥军从蒂罗尔高地进行威胁，另一支奥军占据着四边形要塞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在皮埃蒙特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抑制了人民的热情的情况

下，意大利目前没有多少希望了。至于苏黎世和约本身，我们特别请注意条约初稿⁴中所没有的两个条款。根据这两个条款中的一条，撒丁担负了 25 000 万法郎的债务，其中一部分应偿还给弗兰茨-约瑟夫，一部分是由于伦巴第—威尼斯银行的五分之三债务转到了它的身上。除了在克里木远征¹⁷和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¹⁸期间举借的债款（路易·波拿巴在几天前提出的一笔数目不大的作为他个人的武装保护费的期票还不算在内）而外，再加上 25 000 万法郎的新借款，撒丁在财政繁荣方面很快就会和它所憎恶的仇敌拉平。我们所提到的另一个条款规定：

“没有参加最近这次战争的意大利各个独立国的疆界如需更动，必须征得参加建立这些国家并保障它们存在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意。”同时，“托斯卡纳、摩德纳和帕尔马的君主们的权利则由缔约大国另行规定。”

这样，扮演完了分配给自己角色的各意大利临时政府，现在被极其轻蔑地忽视了，而被它们抑制在那样寻常的消极状态下的居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到维也纳条约¹⁹缔造者的大门口去乞讨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0 月
20—21 日

载于 1859 年 11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8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卡尔·福格特对 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²⁰

1859 年 11 月 7 日于伦敦

我从汉堡一位朋友寄给我的《自由射手》第 132 号中看出，爱德华·梅因认为他有责任过问福格特案件，在其中发挥自己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逻辑的马力，或者更确切些说，他的逻辑的驴力，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绝妙的论断上：既然他同布林德的关系很好，而布林德却没有寄给他匿名传单 的副本，可见我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原本一定是假货。由于他还有一点儿小聪明，他自然避免直截了当这样说；他是转弯抹角说的。

顺便说一句，我希望爱德华·梅因先生拿出证据来，说明我的时间毫无价值，可以用攻击德国庸俗民主派这样的事情把它浪费掉。

从 1850 年底起，我就同伦敦的德国流亡团体断绝了一切关系，维系这个团体的惟一基础是同我作对，在我抽去这一基础之后，这个

① 卡·布林德《警告》[传单]。——编者注

团体就彻底瓦解了。由于像梅因这样一些代理人大卖力气，例如他公开鼓动支持金克尔派反对卢格派，瓦解过程就特别加速了。那以后的 9 年中 我一直是《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 这家报纸有 20 万订户，读者范围大致和《自由射手》相当。我是否有一次提到过哪一位德国庸俗民主主义者？我是否用片言只语回敬过对我的卑鄙攻击？虽然过去 5 年中 德国报刊 特别是美国的德文报刊 曾满纸是这些英雄好汉对我的攻击。

不错，这期间我攻击过爱德华·梅因先生有尊敬仰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没有诽谤过他们。例如，我攻击过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帕麦斯顿勋爵。由于不仅英国不同派系的报纸——从宪章派²¹的《人民报》到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自由新闻》都刊载了我的“诽谤”而且伦敦、设菲尔德和格拉斯哥没有我的参与就把它翻印了至少 15 000 份单行本，我就更罪不可赦了。此外，我在这时期还揭露过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最初是在我的德文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一著作在德国边境各处遭到没收，但在美国流传很广，当时伦敦的宪章派机关报刊登过它的摘要²²。我直到今天还在《论坛报》上“诽谤”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波拿巴”分析他的财政制度 他的外交 他的作战方法 他的拿破仑观念。路易·波拿巴给《纽约时报》寄过一封公开信 感谢它对这些“诽谤”攻击进行了反击。7 年前 我在《揭露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甚至揭露了“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施梯伯 该书在巴登—瑞士边境被销毁了。这一点，梅因先生怎么也会谅解我的。今天这种诽谤是符合民主的，因为“得到最高当局的恩准”。除了爱德华·梅因先生的报纸 以

① 《自由射手》。——编者注

外 约瑟夫·杜蒙先生在科隆的报纸 也证明我常常弄错时间。1848 年和 1849 年 当我敢于在《新莱茵报》上出面维护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民族时，有谁比约瑟夫·杜蒙先生在科隆的报纸上挑剔得更厉害、叫嚣得更凶呢？不错，当时还没有一个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把‘自由主义的’恩惠赐予各民族。至于《新莱茵报》过去的编辑们始终忠实于自己的观点，这是连从前的约瑟夫·杜蒙先生、现在的朱泽培·德尔蒙泰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中也看出了的。对于‘狭义的’爱德华·梅因式的民主 我在经过 9 年的不加理睬之后 只不过有两次 而且是最近 打破了沉默：一次是反对科苏特，另一次是反对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先生。的确 我在《人民报》上对金克尔在《海尔曼》中的美学宏论从纯粹语法观点提出过一些意见。除了那篇标题为《偷梁换柱》的论维拉弗兰卡和约的文章²³ 以外，这就是我给《人民报》写过的全部东西。但是在爱德华·梅因看来，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似乎有权破坏句法的“专横”规则，正如有权从共和主义阵营转向保皇主义阵营一样。

在这封信的结尾，我所处的窘境同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开头所处的窘境正好相反。他是想从有到无，而我则想从无到有，即从爱德华·梅因到福格特案件。为了不多费笔墨，现在向卡尔·布林德提出以下问题：

(1) 5 月 9 日在乌尔卡尔特所组织的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有没有把内容同《警告》这个传单完全相符的关于福格特的消息告诉我？

(2) 布林德是不是在 5 月 27 日伦敦的《自由新闻》上发表过一篇

① 《科隆日报》。——编者注

题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匿名文章，内容基本上同传单《警告》一样，只是删掉了福格特的名字？

(3) 布林德有没有委托别人在伦敦索霍区利奇菲耳德大街菲·霍林格尔先生那里自费印刷过上述传单？

不管梅因民主派怎样支吾搪塞，也不管伟大的陌生人、“卓越的法学家”约瑟夫·杜蒙先生是否乐意，一切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是谁让印刷《警告》这个传单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只是因为翻印这个传单而受到控告。福格特认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洗清的只是这个传单上对他的指控。在印发传单的人面前，正如罗伯特·皮尔说的：摆着三条路。或者他是有意撒谎。我不认为卡尔·布林德会这样。或者他后来确信，使他有权印刷这个传单的材料是伪造的。那他更应该加以解释。最后，或者他手中有证据，但出于个人考虑，他想暗中了结这全部事情，并且用宽宏大量的谦逊精神忍受那些扔向我而不是扔向他的臭鸡蛋。但是，在为了弄清有名无实的德国帝国摄政和现实的法国皇帝之间的关系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难道不应该把一切个人考虑都置之度外吗？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1 月
7 日

载于 1859 年 11 月 19 日《改革
报》第 139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声 明²⁴

福格特很了解自己的同伙，他玩了一套很巧妙的手法，把揭露他
的人的来源从所谓民主营垒转嫁到社会主义营垒。但从我这方面来
说，我对助长这种混淆丝毫不感兴趣，所以不能对布林德在奥格斯堡
(总汇报》第 313 号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

(1)5 月 9 日在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群众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曾
把传单《警告》上对福格特的全部指控告诉过我。这些细节他也告诉
过别人，例如弗莱里格拉特。从内容和语言上看，他的口头讲述和印
出的传单完全相同，所以一开始便很自然地认定他是传单的作者。

(2)在 5 月 27 日伦敦的《自由新闻》上登出了一篇题为《康斯坦
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布林德的匿名文章，这篇文章基本
上是传单《警告》的先声。布林德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认识一些德国
的自由派和伦敦的民主派，有人建议他们宣传波拿巴主义以获取“巨
额贿赂”。当快要审理福格特的诉讼的时候，《自由新闻》主编多·科
勒特先生来找我，他代表布林德请求我不要利用我知道的上述文章
出自谁手这一实情。我回答科勒特先生说，我不承担任何义务，我是
否保持缄默，更多地取决于布林德的言行。科勒特先生也认为这是
完全正当的。

(3 菲德利奥·霍林格爾的聲明可笑之至。

菲德利奥·霍林格爾知道，他印刷傳單不標明印刷地點是公然違反了英國法律。所以他擅自給自己造了一個證明，說他同這個小小的過失毫不相干。《人民報》上轉載的傳單用霍林格爾印刷所還保存的活字版排印，純屬偶然。這樣一來，也不用證詞，只要把傳單同《人民報》轉載的傳單略加對照，就可以在法庭上證明，傳單“出自菲·霍林格爾印刷所”。若是把案件從奧格斯堡移到倫敦，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秘密就都揭穿了。

卡爾·馬克思

1859年 11月 15 日於倫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蘭公園路格拉弗頓坊 9 號

卡·馬克思寫於 1859 年 11 月
15 日

載於 1859 年 11 月 21 日奧格斯
堡《總匯報》第 325 號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歷史考證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譯

卡·马克思

德国的动荡局势²⁵

1859年11月15日于巴黎³

现在德国人的纷争提上日程了，不管这个纷争在广大群众心目中多么无关紧要，但是它却有可能酿成德国的、甚至是欧洲的灾难。这个为占主导地位的条顿大国提供纷争口实的小国，在合众国的历史上名声很坏。大家知道，英国曾经在德国买了成千上万的受过训练的奴隶，经过大西洋送到自己发生骚乱的殖民地，这批奴隶主要是黑森-卡塞尔提供的。因为黑森-卡塞尔的宗法制选帝侯通常是用自己忠实的臣民去换不列颠的黄金来取得收入。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时代起，历任选帝侯和他们臣民之间的关系看来变得越来越敌对了，直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²⁶发出黑森-卡塞尔革命²⁷的信号。这场革命得到现任选帝侯的暗中支持，当时他非常渴望同他亲爱的父亲分担最高权力的责任。小小的革命为1831年1月5日的黑森宪法扫清了道路，该宪法现在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斗争的主要战斗口号。1850年，这部宪法驱使它们在布龙采尔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战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威廉第二。——编者注

斗 而在路易·波拿巴把“意大利问题”搞成一件惹人厌烦的事情以后 如果情况顺利 这部宪法可能很快促使他研究“德国问题”。为了说明当前的冲突，不妨简略地评述一下 1831 年的黑森宪法、它所经历的变迁以及使它的命运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霸野心纠缠在一起的那些事件。

1831 年的黑森宪法，抛开它所规定的选举办法，即由各旧有等级 贵族、城市居民、农民 选举代表的方法不谈，可以认为是欧洲曾经宣布过的一部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根本法。没有哪一部宪法对行政机关的权力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使政府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广泛的监督权。为了说明这个奇怪的事实，可以说，1831 年的黑森革命实际上是律师、文武官员同各个“等级”中怀有不满情绪的人们协调一致所进行的反对君主的革命。根据宪法第一章的规定，凡是拒绝对宪法宣誓的黑森亲王一律剥夺王位继承权。关于各部大臣的责任的条文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空话，它使代表们能够依靠国家法院来解除任何一个大臣的职务，只要他被认为是犯有哪怕是曲解立法议会的某项决定之罪过。君主被剥夺了赦免权。他既无特权违反政府成员的意志让他们退休养老，也无特权将他们革职，因为他们有权随时向法院上诉。法院有权对有关官员任免奖惩制度的一切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古代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实行检查和监督，并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是下级执行上级命令时违反宪法，也不得例外。于是，政府官员便摆脱了王权的控制。另一方面，法院由于握有对行政机关的一切法令条例作出最后裁定的全权，便成为全能的了。由人民选举的市镇会议员，不仅应关注本地的，而且应当关注全国的法律实施情况。军官们在服兵役之前必须

宣誓效忠宪法，这样他们在各方面，在对王权的关系上就享有同文职人员完全一样的权利。代议机关只由一院组成，它同行政机关不论发生什么冲突，都有权停止征收一切费用和赋税。

1831 年的黑森-卡塞尔宪法就是如此。当今执政君主的父亲威廉第二选帝侯“在各个等级的完全同意下”宣布了这部宪法，并且

“衷心希望它将作为君主和臣民之间和睦一致的牢固纪念碑永世长存”。

接着这部宪法的草案由政府提交给德意志联邦议会²⁸ 联邦议会虽然没有作出保证，可是显然把它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了。可以预料，尽管有一切善良的愿望，宪法机器在黑森-卡塞尔也是注定不能顺利运转的。从 1832 年到 1848 年，立法议会开会至少不下 10 届，其中有两届甚至任期没有满就更换了。1848—1849 年革命使 1831 年宪法具有了更加民主的精神：等级选举制废除了，最高法院成员的任命权转交给了立法机关，最后，从君主手中收回了对军队的最高监督权并把它转交给了要对人民代表负责的人——陆军大臣。

1849 年，当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第一届黑森立法议会开幕的时候，德国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反动；不过，一切都还处在蠢蠢欲动之中。旧德意志联邦议会²⁸被革命浪潮扫除了，而德国的国民议会²⁹连同它那虚有其表的政府也被刺刀推翻了。这样一来，整个德意志联邦的中心便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要求恢复法兰克福的旧议会，那里它的影响始终是占据优势的，而普鲁士则力图建立北方联盟³⁰，想利用和控制这个联盟。有 4 个德意志王国和巴登支持的奥地利，实际上已设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把旧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残余聚集到自己周围，而普鲁士也稍微尝试了一下，在一些较小的邦的参加下在爱尔福特组织联盟议会³¹。不言而喻，受自己的自由主